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角度透视共享发展理念\*

吴 静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核心，是历史规律认知深化的结果。它同根源于儒家文化的天道大同理想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理论工作者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准确的定位：个人组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实现终极发展目标的价值诉求。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在脱离抽象的实践层面上来理解共享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现代性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共享发展 规律 现代性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

自古以来，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诉诸了一切可能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所提供的空间是怎样一个外在的形式和平台，内在所表达的仍然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社会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正是对这一整体性目标的全面概括和总结。而其中的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理想目标的核心之一。

尽管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来看，以滥觞于《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所建构出来的乌托邦社会构型中就已经有了“共享发展”的雏形，但是，这种根源于儒家文化的天道大同理想，与今天所提倡的新发展观前提下的“共享发展”理念，依然存在一些本质的区别。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准确的定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脱离抽象的实践层面上来理解共享的意义，而且更体现了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核心，是历史规律认知深化的结果。应该承认，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展到今天，从经济生产方式到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随之而来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自然也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作为社会发展指导方向的核心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就当代而言，随着转型社会的多维度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态势的进一步加强，全球化经济现实前提下的阶层群体和地域空间的非均衡差异凸显，如何恢复甚至扩大被不断地层级化所挤压的社会公共空间、实现和保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应、维护社会的公平公义以及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进步，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能从改革与发展的目的性层面进行中国经验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总结，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突破口。换言之，正是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客观存在，构成了

\*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研究”（编号15ZD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勒兹与鲍德里亚现代性批判比较研究”（编号13CKS032）的阶段性成果。

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现实背景和根本原因。”（王淑荣、许力双，第14页）这意味着，包含共享发展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并非一种纯理论层面的探讨，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逻辑合理性作为支撑，同时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现实的关照情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之路，是对当下社会发展的明确意识。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解。

## 一、共享发展是个人组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

在很多解读性的文章中，共享发展理念经常被理解为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这当然没错，但是，包含了一定的局限性。追根溯源，在《礼运大同篇》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以儒家的“大道”为准则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价值需求。尽管此时的“大同理想”更多地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思乡式恋慕，但是，已脱离了纯粹伦理层面的呼吁。因为社会组织方式本身恰恰是价值需求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到了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更是明确提出，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的理想社会。

从这里不难看出，即便就历史而言，共享发展也已经并不单纯地是对乌托邦社会的价值要求，而其本身就是以物质生产资料的共有（共享）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从本质上发端于共享和协作，无论是从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使用方面，还是在经验分享与关系建构方面，在不同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共享特征。换言之，只有以此为前提，由个体形成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共同（共享）发展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献中对这种共享基础的肯定仍然停留在“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简单认识上，表面上看起来，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这种原始的“大同思想”与在现代性条件下考量共同性的可能性问题并不能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在解读共享发展原则时必须找准的时代脉搏。

在流动的现时代条件下，与土地和宗法解除了束缚关系的现代人，陷入了一个外在强制被消解、多元差异被承认、竞争无所不在以及遍布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不可预料性的世界，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而引起的焦虑和不安使得经济个体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了寻求安全感，人们期盼重建共同体。如果说工业社会前期的私有制发展历程彰显了“经济人”的“自利”原则，那么，在当代语境中，在从自然意志主导的礼俗社会到理性意志主导的法理社会的转换中，“经济人”的动机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自利”并不是唯一的行为驱动力，这就使得社会的经济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都呈现出前工业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复杂性，从而也为一定程度地发展共同性奠定了可能。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开始关注互惠理论。古德纳（Alvin Gouldner）在1960年提出了“广泛道德交换模型”理论，认为互惠起源于“如果你想得到他人帮助，就必须帮助他人”的变量交换。（cf. Gouldner）这种理论模型脱离了对行为的泛伦理化考量，以经济学的交换原则解释了交换的本质：赠与和接受都是共同体关系赋予的义务，同时也是群体间特殊的分配方式，其目的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团体之间的和谐与发展。在古德纳主张对互惠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lins）提出了对不同类型的互惠形式进行区分的学说。

近年来，互惠理论的研究更是超越了对礼物的经济学分析，开始考量非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大规模共同体中协同合作的可能性。随之，强互惠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比其他

物种更高度的合作关系，在于许多人都具有这样一种行为倾向：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得到补偿。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但实施这种行为需要个人承担成本。之所以将这种行为命名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是为了区别一些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等弱互惠行为。强互惠与利他、弱互惠的区别在于：利他行为是无条件仁慈的，善意不依赖于对方的行为；弱互惠行为要依赖于别人的行为，弱互惠者愿意支付短期成本来帮助别人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长期或间接利益；而强互惠行为则是在目前和未来都不能期望得到收益的情况下支付成本来奖励公平和惩罚不公平的行为。”（韦倩）简言之，强互惠模型所解析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般经济学和政治学关注的公共政策的行为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把共享发展当作共同体发展的目的，那么，社会协作能够推进的共享（包括生产资料、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就必须成为它的基础。

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提出的“宽泛理性观”，不仅成功地挑战了个人自利主义的理性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森认为，人类的动机呈现出难以想象的多样化形态，换言之，人类的实践理性本身不是单纯利益指向的，而是表现为自由而开放的趋势。人们既可能出于自利的目的而作出选择，也完全可能形成超越自我利益的选择（道德、伦理、宗教等原因），甚至可能作出完全利他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单纯以自利性作为判断个体行为的评判标准是片面而不准确的，理性本身应当被宽泛地理解为个体“合理的自我省察”。（参见森，2006年；2012年）森的动机多样性理论，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内所容纳的人与人关系的丰富性的确认，它可以被理解为共享理论系统推进的元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等一系列现实举措，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基本原则的贯彻。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不但获得了其正当性，而且被明确地肯定为整个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共享现实关照的目标。而“一切人的自由”本身能够被实现，必须建立在以社会管理共同财产基础上的公有制条件下。这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定共享发展目标的历史根基。从互惠利他到共享发展，现代性条件下的共同体的可能性从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组织学各方面都得到了历史性的确认。它是符合历史认知规律的创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支点。共享发展的实现，也必将如《共产党宣言》所肯定的，是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其他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根本性区分开来的标准之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 二、共享发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共享发展理念之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有所区别，在于它的内涵所指与时代性两方面。在就它的内涵已经有所讨论之后，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它的时代性。而对时代性的剖析，当然必须从历史条件入手。这一历史条件是指现代性语境之下的全球化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本身并非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它暗含了一个经济现实的前提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彻底的私有化。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逐步透视到了造成这一现象的现实根源——私有制。尽管对于工人在雇佣劳动中被异化的情境抱有极大的同情，马克思却并没有

以伦理的谴责来简单对待。他这样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私有制的产生有着“历史必然性”，“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它必然要发展到“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110、10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财产私有化是以对抗性作为其根本原则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以劳动为中轴，少数人（资本家）和多数人（无产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源则在于对“资本”的占有与否。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将“资本”粗略地定义为“商业运营的成本”。即使这种界定到李嘉图那里有了巨大的飞跃（从一般性商业运营具体到生产领域），也不过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李嘉图，第78页）。这种看似客观的描述使得原本具有特定立场的“资本”变成了一种中性化的劳动积累（“国家财富”或一般性的社会共有财富），它恰恰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剥削的本质，对抗性的矛盾被隐藏起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直接瞄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本质核心，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主要的秘密所在。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雇佣劳动过程并不是一般性的抽象化劳动，它具有其特定的情境。简言之，就是少数人（资本家）对人类历史以各种方式——无论是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还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起来的财富以及其他非物质性财产进行无偿地占有，并用以剥削劳动者（无产阶级），从而形成对抗性的矛盾。这种因对财产的占有权力的私有化而产生的对抗性，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由它所引发的或和缓或激烈的矛盾冲突，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而存在。因为私有制既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性的、趋于没落的生产方式，而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它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与“资本”真正相关的并不是中性的生产，更不是一切社会条件下的生产过程，而是产生出了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它特有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该过程、该生产方式自身无法解决的。在这种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地理发展不平衡现象，也加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对抗性。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资源分布不均和历史成因而造成的区域之间的差距以及职业、阶层分化，也使得社会结构内部之间的对抗性日益显露。而共享发展理念正是从理论高度对这一问题意识毫不回避的确认，它的现实指向在于，破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固有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这是对发展中问题的深度具体化。

马克思以商品作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他通过对商品中所凝聚的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运作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必然结果出现的、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导致的阶级对抗性。这是经济发展中撕裂社会的顽疾所在。因此，社会主义要在现代性条件下发展，就必须直面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生的这种对抗性，也就必须解决社会财富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对立。这也正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所在。它所要解决的行业收入差距显著、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保障不够健全、教育资源不公以及公共服务总量不足且配置不够合理等问题，都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对人的生存情境的关注。这实际上是对发展如何展开进行具体思考的范畴，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自身所逐渐呈现出来的客观逻辑的领悟和理解。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对于一个理论本身的意义和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认定，不仅可以用来判断它是否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而且能够判断在何种程度上该理论的思想“在那一疑难问题中展开并

认可”马克思的思考；或者反过来，在何种程度上该理论所试图解决的疑难问题“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疑难问题，且把马克思主义的难题和疑问当作自身探究领域内的紧迫问题来对待”。（詹姆斯，第327页）事实上，当众多的经济发展理论越来越致力于肯定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以全面私有化、市场开放和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发展思路时，新发展理念所涵盖的包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全民发展在内的丰富内容已经由单纯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它既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难题进行回答的努力，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肯定，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确认。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包括共享发展在内的新发展观的提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实现全社会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全民共享，它本身不但正视了现代社会中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也肯定了多样态的现实合理性，是社会宽容和理性的高度发展。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对传统所有制框架的突破，而从“共同富裕”走向“共享发展”，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必然进步。

### 三、共享发展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它与社会主义本质之间存在着天然亲近，共享发展不但是社会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共同体所诉求的社会价值要求。共享发展既是在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和完成发展，也是在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和满足共享。个人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但不应当被集体价值所排斥，甚至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之一。这也正是五中全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所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首的原因。

对这一核心原则的理解，必须回到马克思对个人主体的平等内涵的理解上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扬弃了从洛克至康德以来甚被推崇的“平等权利”说，认为这种从自然权利出发的平等观的内在缺陷在于：无视个体差别，将鲜活异质的主体同质化。“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虽然马克思承认，这些有问题的、衡量平等的标准“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sup>①</sup>，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同上）但要真正直面主体的多角度和多样性的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同上）

这种不平等的平等才是“十三五”所力图实现的、蕴含着个人主体的个性发展的平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同上，第305-306页）换言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丰富基础上实现共享条件下的主体性自由，不是抽象的、被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原子化和均一化的刑事法权的平等自由，而是承认个体差异和多样性的、面向开放和丰富性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条件下的平等。它是共享前提下的“人的全面解放”。

①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本文作者注。

也就是说,从长远看,真正的共享理念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由主体性自由支撑起来的社会共享,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它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共同体中的个人主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而《哥达纲领批判》在这个方面作出的理念界划,正是社会共同体终极发展目标所需要的价值指向和路径引导,它要求在个人权利方面的发展能够同时重视当下性与可持续性、阶段性与可持续性、目标性与过程性,与我党所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相互应和。

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飞跃,是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今后的发展实践所必须遵从的导向。新发展观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联系,形成支撑。因此,共享发展本身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它所要完成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社会结构中的伦理价值关系建构,而是涉及各个方面的现实利益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五大发展理念之所以被明确地提炼出来,是根源于对发展现阶段的矛盾与问题的认识与正视。当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得不面临众多方面的多样性挑战,因而,其在实践方面所可能遭遇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就是寻找如何立足于共享发展理念去促进和完善改革的切入点。因此,必须坚持批判性的思维,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的准则去发现和分析重要的现实问题,掌握共享实现的机制,实现世界性与中国性、一般性与特色性的结合,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发展目标。

#### 参考文献

古籍:《礼记》。

李嘉图,1976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森,2006年:《理性与自由》,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淑荣、许力双,2016年:《共享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与实践指向》,载《红旗文稿》第4期。

韦倩,2010年:《强互惠理论:起源、现状与未来》,载《光明日报》8月3日。

詹姆逊,2004年:《新马克思主义》,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ouldner, A. W., 1960,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作者单位: 海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王 琦 (实习)